

在某種程度上，這意味着制度並不是甚麼可靠的變項，它只是理性選擇的結果。這種中介變項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令人懷疑的。該書至少涉及了四個方面的制度：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官僚機構、財政與稅收、國家的經濟干預。但究竟哪些制度對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儘管在研究方法和理論框架上，該書有其不足之處，但是書中涉及的兩個核心問題卻是比較政治經濟學中最重要的議題，足以引發我們對後發展國家的進一步思考。對於後發展國家而言，過早的民主化是否會阻礙經濟發展？其制度的形成與經濟的發展僅僅是由精英的選擇所決定的嗎？

## 新發現的張學良

● 劉 岩

現今海內外研究張學良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然而對張的評價也多是陳詞濫調。《劫蔣者之夢》對既有史料重新梳理之後，對張有了與眾不同的解讀，尤其是對西安事變進行了鞭辟入裏的分析，廓清了許多歷史真相。



陳守中：《劫蔣者之夢：新披露的西安事變內幕》（紐約：明鏡出版社，2010）。

張學良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傳奇人物。與其早年的叱吒風雲相比，晚年的囚禁生涯則不免顯得落寞。在中共官方的評價體系中，張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雖然他在「九一八事變」中有過不太光彩的表現，但憑其在西安事變中的「豐功偉績」，他還是以「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形象出現在世人的面前。

現今海內外研究張學良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然而對張的評價也多是陳詞濫調，尤其是中國大陸學界因囿於官方意識形態的窠臼而難以產生真正有價值的著作。2010年，旅美學人陳守中著成了《劫蔣者之夢：新披露的西安事變內幕》（以下簡稱《劫蔣者之夢》，引用只註頁碼），對既有史料重新梳理之後，

對張有了與眾不同的解讀，尤其是對西安事變進行了鞭辟入裏的分析，廓清了許多歷史真相。

自從1928年張學良繼任為新一屆「東北王」後，東北易幟可謂其一生中絕無僅有的一次壯舉。平心而論，不論其初衷為何，此舉最終還是有助於國家統一的。少年得志的張不久就加入到軍閥混戰中，中原大戰時，他周旋於各方，待價而沽，直至大勢已定後才出兵協助蔣介石取得了戰爭的勝利。此次「調停中原大戰」，張幾乎不費一兵一卒，就攫取了中央軍官兵在槍林彈雨中以鮮血換得的戰果（頁509）。在他輕而易舉地取得了華北的統治權後，可謂「天下三有其二」（頁510），張成為最具實力的地方軍閥。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是張學良人生悲劇的起點，「不戰而失地」使他成為「國人皆曰可殺」的不抵抗將軍，失地喪權的國家與民族罪人（〈前言〉，頁9）。關於「不抵抗」的責任問題，張早年屢次為自己與東北軍辯護，言語中流露出「代人受過」的意思，而且其親信也證實張的確收到蔣的「不准抵抗令」（頁440）。長期以來，學界一直奉此說為圭臬，認為張只是被動的執行者，蔣才是始作俑者。毫無疑問，神秘的「銑電」才是解開「不抵抗」之謎的關鍵。然而迄今為止，一直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蔣曾下達過此密電，而張至死也拿不出真正的不准抵抗命令（頁59）。學者胡志偉經過深入探究後斷定所謂的「銑電」只是個子虛烏有的東西（〈代序〉，頁40），而楊

天石更是明確指出「九一八之夜，張學良在未向南京國民政府請示的狀況下，向東北軍下達了『不抵抗命令』（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Ⅱ》〔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頁51）」，作者也認為張故意偽造「不抵抗命令」，把「恥國喪地的罪惡誣於蔣公」（頁412-13），讓蔣替自己揹了幾十年「黑鍋」。

《劫蔣者之夢》揭露，張學良不僅在事變前還在北平醉生夢死，對於即將到來的戰爭沒有任何思想準備，而且在聽說日軍正在組織暗殺團後，就稱病躲進了北平協和醫院，成為「我國歷史上最貪生怕死的將軍」（頁502）。張在東北淪陷的過程中，自始至終也沒有回到前線主持大局，自己的億萬家產也留給了日軍作為軍費。十幾萬東北軍幾乎沒有進行任何像樣的戰鬥就撤出了戰場，張「拱手將完整無損的東北交給日本」（頁505）。張之所以如此行事，通常公認是其執行蔣介石的密令的結果，而作者卻認為原因在於他「只希望拱手讓出東北，換取日本讓他能繼續割據平津」（〈自序〉，頁44）。張根本就沒有「打回東北」的打算。他不但拒絕了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趁日軍在東北的兵力空虛而出兵收復失地的建議，反而還密派親信赴日言和，妄圖出賣祖國主權，換取日軍讓他割據華北（頁183）。

張學良身為東北的最高軍政長官，理應擔負起保家衛國的責任。然而，他所構想中的抗日是全民抗戰，而不是東北軍孤軍奮戰，一旦

迄今為止，一直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蔣介石曾下達過「銑電」，而張學良至死也拿不出真正的不准抵抗命令。作者認為張故意偽造「不抵抗命令」，把「恥國喪地的罪惡誣於蔣公」，讓蔣替自己揹了幾十年「黑鍋」。

作者認為張學良之所以敢公然劫持國家最高元首，是因為他想效法盛世才的「成功之路」，在蘇聯的支持下將遼闊的大西北，從中國領土中割裂出去，像外蒙古那樣成為蘇聯的附庸，建立自己的張氏王國。

拼光了家底，自己將失去在政治舞台上的資本。對張來說，抗日只不過是「為他人作嫁衣」，是蔣介石的「借刀殺人」之計，受益的是南京政府。事變之時，蔣正在江西忙於「剿共」大業，對於事變的情形根本就一無所知，更不會下達任何命令。正因為實在拿不出「不抵抗命令」，張在晚年重獲自由時才矢口否認種種謠傳，承認「不抵抗」的主要責任在自己，「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李名揚：〈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報》，2001年10月16日）。當張再也不能推卸自己「不抵抗」而丟失東北的責任時，他本人不僅否定了「銑電」的存在，還改口稱是由於自己「沒有認清日本侵略意圖」所致（頁475）。

作者認為張學良既沒有抗日的心意，也沒有抗日的能力，因為「東北軍是當時中國各軍隊中戰鬥力最弱，紀律最差的軍隊」（頁88）。1933年熱河抗戰時，因擔心出兵熱河會觸犯日軍而危及自己割據平津，張幾乎就沒有作認真的抗戰部署，結果數十萬東北軍竟讓百騎日軍輕易地佔領省會承德。屢屢喪失國土的張不得不引咎辭職，但他在下野後又「毫無心肝」地豪遊歐洲。他一直生活糜爛，揮金如土，是當時中國最腐朽的軍閥（頁87-88）。在豪遊歸國後不久，張又聯絡各路軍閥「軍事倒蔣」，完全罔顧當時中國最需要統一來對外禦敵的事實。在整個對日作戰過程中，張白白地糟蹋了東北與華北的資源而沒有為國

家做任何事情，「張的不抵抗激起對方的貪欲，其危害遠遠超過不抵抗本身」（頁501）。

至於1936年的西安事變則不僅改變了張學良的命運，也使中共絕處逢生。陳永發認為，雖然中共在事變前沒有參與籌謀，但是事變的發生與其宣傳攻勢有關，而且「在事變發生後，中共依憑冷靜的理性處理局勢，成為事變的真正受益者」（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頁319）。後來中共對張的評價如此之高也主要源於此，毛澤東就說過「西安事變把我們從牢獄之災中解救出來了」（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454）。關於張發動西安事變的原因，學界一直認定他是受中共的正義感召而「逼蔣抗日」，作者卻認為張之所以敢公然劫持國家最高元首，乃是因為他想效法盛世才的「成功之路」，在蘇聯的支持下將遼闊的大西北，「從中國領土中割裂擊〔出〕去，像外蒙古那樣成為蘇聯的附庸」，建立自己的張氏王國（頁82）。

當時，在相繼喪失東北與華北兩大棲身之地後，張學良主動請求調往貧瘠的大西北，使自己遠離抗日的前線。盛世才在蘇聯的支持下得以在短時間內成為獨霸一方的「新疆王」，他的崛起撩撥了張的野心（頁152），使他欲沿着盛的成功足迹前進。與其他軍閥一樣，張也一直憂懼中央軍會藉機吞併自己，於是為維護割據地位而極力阻撓國

家統一。熟知「軍閥文化」的毛澤東投其所好地以蘇援為餌，誘使張「另立局面」，為中共火中取栗。此舉正中其下懷，張不僅在「剿共」時陽奉陰違，而且還與中共、西北軍領袖楊虎城在基於共同反蔣的基礎上建立了「三位一體」的關係。

在1930年代，為了避免德、日的兩面夾擊，蘇聯一直希望中國能夠牽制部分日軍來減輕自己的壓力。在考慮到蔣介石在中國的名望與地位後，蘇聯意識到蔣的存在對於自身安全的重要性，因而也就放棄了敵視南京政府的政策。為了能改變四面受敵的困境，蘇聯不僅迫使中共改「抗日反蔣」的方針為「聯蔣抗日」，而且在得知張學良與中共密謀之事全是針對中央的內亂之舉後，就明確反對中共吸收張入黨。然而，中共並沒有將蘇聯的真實態度對張和盤托出，反而以錯誤的信息「引誘」他一錯再錯。

在渴望得到蘇援的壯膽下，利慾薰心的張學良也日益無所顧忌，決定在中共最危險的時候挺身而出（頁394），以劫蔣來捍衛中共。張將個人的利益看得遠高於國家主權與民族的尊嚴，作者認為張所「乞求」的蘇援只能用於叛亂，「根本就不能用於對日作戰」（頁106）。張對抗日根本就不感興趣，心中所想的只有「另立局面」，他只是假抗日之名來行割據之實。張早已丟失了東北，現又欲出賣遼闊的大西北。所以，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愛國抗日的張（頁63），張只能是毛澤東「黨文化」的「民族英雄」與「愛國者」（頁574）。

張學良本以為憑着國共之間的血海深仇，蘇聯會對蔣介石恨之入骨，而自己代中共除去蔣定會深得斯大林的信任。所以說，張劫蔣本是為了向莫斯科顯示忠誠之舉（頁242），而且為了表示誠意，事前並沒有與中共商量。孰料，蘇聯在得知事變消息後就知道這是「中共用蘇聯援助來煽動張發動的叛亂」（頁344-45），而斯大林早已認識到蔣介石的存在對蘇聯的安全至關重要，因而嚴厲指示中共務必放棄除蔣預謀，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以確保蔣的安全（頁396-97）。蘇方認為張一旦「除蔣」，中國必然會陷入四分五裂的狀態，無力與日軍繼續作戰，這將完全打亂蘇聯欲把日本戰爭禍水引向中國的戰略方針（頁101）。

作者指出，「蘇聯態度是張學良思想轉變的關鍵，左右張學良的決策與蔣公的命運。」（頁342）在得知蘇方的態度後，張不知所措，自己苦心經營多年的「割據西北」計劃成為泡影。進退失據的張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壓力，此時連中共也背信棄義地拒絕公開「三位一體」的關係，使他後悔輕信其當初的空頭許諾。面臨絕境的張幸虧為自己留了一條後路，他不僅抵住了毛澤東的「除蔣」鼓動，還力排眾議地堅持無條件釋蔣。走投無路之下，張只得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是「為了卸下扣押自己祖國元首所承受的重負，以及重新投靠南京的必然結果」（頁110）。

從表面上看，張學良冠冕堂皇地表示「聯共」的目的在於「逼蔣抗日」，而實際上他只是希望中共幫他「肅清蔣系勢力」與「取得蘇聯援

張學良冠冕堂皇地表示「聯共」的目的在於「逼蔣抗日」，而實際上他只是希望中共幫他「肅清蔣系勢力」與「取得蘇聯援助」。他與中共締結聯盟本就是互相利用的權宜之計，因缺乏穩固的基礎而難以長久。

作者顛覆了對張學良的許多正面的評價，使人們對他有一個更加接近真實的了解。本書雖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但畢竟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對於推動張學良研究的價值還是有目共睹的。

助」(頁378)。他與中共締結聯盟本  
就是互相利用的權宜之計，因缺乏  
穩固的基礎而難以長久。後來張不  
但推脫劫蔣的責任，還主動地向蔣  
介石獻上「剿共」策略，由此，張與  
中共的關係可見一斑。當然張苦苦  
哀求加入中共的動機，也絕非出自  
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而是為他的「另  
立局面」而服務。張從來就沒有真心  
維護共產黨的利益(頁563)，他發動  
西安事變也完全是為了自己。鮮為  
人知的是，大多數的東北軍官兵對  
於張發動事變根本毫不知情，而那  
些積極策劃事變的軍官，如孫銘九  
等後來都淪為了可恥的漢奸。

張學良在發動事變之初不會不  
知道自己此舉所要冒的風險有多  
高，但也估算過這背後的回報會有  
多大。他一旦成功地獲得蘇援，便  
可以「在西北建立張氏王國，甚至  
取蔣而代之」(頁248)。幸虧張的  
「陰謀」沒有得逞，否則軍閥之間戰  
事一開，日軍會藉機佔領中國也  
猶未可知。「西安事變是以外蒙為  
師，步盛世才的後塵的嚴重叛亂。」  
(〈自序〉，頁50)張欲出賣大西北來  
換取蘇聯的支持，據地稱雄，可見  
他根本就不具備「愛國抗日」情結，  
「這是西安事變迄今仍是一個謎的  
真正原因」(頁103)。在時局動蕩之  
秋，張此舉無異於自毀長城，陷國  
家與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張的行  
為遭到海內外的一致譴責，因為人  
們認識到「蔣公是中國統一的象徵，  
當時中國最需要的是統一」(頁206)。

西安事變後出現了有利於全國  
抗日的新局面，不僅蔣介石停止了  
大規模地「剿共」，更為重要的是中

共也基本放棄了以武力推翻中央政  
府的「叛亂」。中國暫時也不再出現  
蔣一旦調兵去抗日，中共就在後方  
攻城略地、變相地與日軍密切配合  
的局面。這或許是整個事變唯一可  
圈可點的地方，也是有悖於張學良  
發動事變初衷的意外「戰果」。

但有些論者也一直對西安事變  
持否定態度，曹長青就認為事變的  
後果主要有兩個：「一是給了共產  
黨和紅軍喘息倖存的機會，結果它  
最後坐大，給中國帶來無窮的災  
難；二是導致中國在沒有準備好的  
情況下被迫倉促提前全面抗日，使  
中國人付出更大的犧牲。」(曹長  
青：〈張學良害了中國〉，曹長青網  
站，[www.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409](http://www.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409))西安  
事變的發生，致使中國失去了一次  
較容易統一的機會(頁538)，使原  
本局限於西北的小內戰演變成後來  
國共之間的大內戰，極大地延宕了  
中國統一的進程。

在中共黨史上，蔣介石是因為  
西安事變才被動地走上抗日道路  
的。這在無形之中不僅拔高了中共  
與張學良在促成全民抗戰中的作  
用，而且也模糊了蔣介石在抗日  
問題上的真實態度。在台灣和海  
外，另一種解釋是，蔣之所以難以  
有效地抵禦日軍侵略，除了考慮到  
國力懸殊而忍辱負重外，還與中  
共和張式軍閥在背後的掣肘有很  
大的關係。從當時的形勢來看，愈  
能延遲抗戰全面爆發的時間，對積  
貧積弱的中國愈有利。因而全國  
人民一致譴責張學良在西安事變  
中的叛亂行為，就連溫和的胡適

也一針見血地指責他「名為抗日，實則自壞長城，國家民族之罪人」（頁122）。

當前中國大陸學界對於張學良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對官方評價進行修修補補的階段，始終將他蓋棺定論為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劫蔣者之夢》中，作者顛覆了對張的許多正面的評價，使人們對他有一個更加接近真實的了解，既不乏詳盡的史料，又不乏精深的理論分析。

本書雖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但畢竟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對於推動張學良研究的價值還是有目共睹的。當然，書中某些地方註釋還不太嚴謹；作者對於有些問題還缺乏較深入的分析，如張入黨之謎；在一些結論的下達上也存在着強烈主觀臆斷的問題；一些問題的解決還有待於新史料的發掘與解讀。我們也期待着更多有價值成果的出現。

## 從「統戰」看「統治」

### ● 畢 苑



胡治安：《統戰秘辛：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

在歷史研究中，史家與研究對象保持時間或者空間上的距離，一般來說有助於保持立場的獨立、分析的客觀；而當事人著史，往往要麼因「避嫌」而擱筆不書，要麼下筆即成為個人歷史的辯護詞。不過，保持距離也有一個劣勢，那就是歷史資料不易獲得，感受容易失真。今讀胡治安所著《統戰秘辛：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引用只註頁碼），令人欣喜。作為歷史觀察者和參與者的雙重角色，作者具有多數研究者無可企及的優勢，又因個人稟賦勤於思考、不戀名利，因而貢獻出了一部獨特的研究。

胡治安1964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分配到公安部第十一局教育處編寫改造人員教材，期間

胡治安所著《統戰秘辛：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令人欣喜。作為歷史觀察者和參與者的雙重角色，作者具有多數研究者無可企及的優勢，又因個人稟賦勤於思考、不戀名利，因而貢獻出了一部獨特的研究。